

跨省异地就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评论员 樊大曷

周末侃

“夺命顺风车”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张静雯

又一个姑娘命丧顺风车司机之手。三个多月前，空姐乘顺风车遇害案之后，我再也坐过顺风车，可心里还是忍不住对顺风车的前景保持审慎的乐观。毕竟，悲剧那么惨痛，滴滴确实做了整改，比如突出了紧急求助功能，本来广受诟病的个性化标签和评论也下线了，司机每次接单之前，都被要求进行面部识别，这一度让司机朋友们吐槽得很厉害。

为了减少安全风险，滴滴关闭了每天22点到6点之间的顺风车服务。可是这一回，那个浙江乐清姑娘，在大白天里惨遭毒手。那些查漏补缺看起来不是挺靠谱么，怎么还是“放过”了一个恶魔？而且谁也没想到，悲剧这么快就重演了，而且几乎拿的是同样的脚本。这叫人恐惧、叫人心痛，更叫人无言以对。

人们对滴滴顺风车的信任怕是再也难以挽回了。好多人都表示要抵制顺风车，甚至呼吁取消这项服务。我一向是拥抱新事物的，对这种“出事就取缔”的声音，向来抱有警惕，可这回，一贯的立场也开始动摇。如若风险如此不可控，还是以“鼓励新事物”纵容其带病狂奔，就有点娇惯孩子的意味了。出事之后，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就没含糊，要求滴滴整改，暂停了浙江地区的顺风车业务。

只不过细究起来，把板子打在顺风车这个服务项目上，冤倒是不冤，但不得要领。

这桩惨案被曝光之后，很快有报道指出在这个凶手作案的前一天，就有乘客投诉过他。那位侥幸逃脱的林女士，先是被诱骗在系统中取消了订单、改为私下交易，尔后被带到偏僻的地方，甚至在脱身下车之后，还被尾随了一段距离。仅凭常识判断，就知道这个司机蓄谋已久、套路熟练，和那些鸡贼绕路的司机显然不是一个性质。只可惜，滴滴客服的认知和常人似乎有很大偏差，在空泛地承诺“两小时之内答复”之后，司机仍旧安然地接单，或者准确地说在狩猎下一个女乘客。这桩投诉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信，直到悲剧发生，才再一次被打捞起来。

三个月前杀害空姐的那个顺风车司机，也曾经因为言语骚扰被投诉过，事情后来不了了之，滴滴给出的理由堪称奇葩，“联系不上司机本人”。于是“失联”的司机，继续畅通无阻地接单。中间不过三个月，两次阻止悲剧的机会一一被“完美躲闪”，姿势竟然还差不多。投诉本是纠错纠错机制，可却接二连三地失灵了。说这只是巧合、不是系统性的漏洞，谁都不信吧。

更让人绝望的是，乐清女孩上了凶手的车之后，也不是毫无生机。女孩遇到危险后发出了求救信号，她的朋友联系滴滴之后，得到的是“一小时之内回复”。这一小时内，焦急的朋友先后催了七次，但都只是被要求继续等待，并表示客服能做的只有“加急标红”。从这番陈述中，大家都能脑补出客服接电话时露出的“职业性微笑”吧。人家急成这样，您就没觉察出事态非同小可么？

“加急标红”之后的结果是让再等一小时。再等一小时的结果，是被告知联系上了司机，但司机否认载过受害女孩。女孩的朋友还曝出了在滴滴客户端与客服交流的截图，朋友心急火燎地索要司机信息，并且说明如果没有信息，警方什么也查不出来，对方回复的是“等待上级人员给您处理”，话尾还加了个淘宝店小二标配的“亲”。呵呵，真是春风般的温暖呢。

昨天，专栏作家易小荷讲述了她被滴滴司机谩骂追赶的经历。她也在客户端投诉了，巧得很，她也被要求等待两个小时，这画风一样的敷衍、一样的冷漠。两小时之后，客服慢悠悠地表示已经搞明白了状况，停掉了那个司机的业务。两个小时中间，她几乎耗尽了洪荒之力，才摆脱了危险，但久久都不能摆脱恐惧。

所以你也看出来，不是顺风车这款产品原罪深重，问题出在滴滴平台的运营上。在程式化、毫无情感温度的平台体系之中，人命关天的事儿，不过是一颗待拧的螺丝钉，和别的螺丝钉没有不同。他们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把螺丝钉拧好，不需要考虑事情是否紧迫、他人是否命悬一线。

在商业上，滴滴这些年可谓大获全胜。只是身体跑得快，灵魂却显然完全没跟上。前不久，河南新乡市的一个110接警员让人刮目相看。报警电话乍一听非常无厘头，是一个姑娘要点外卖，但耐心又机智的警员马上嗅出不对劲，最后成功救出了被胁迫的姑娘。警察同志如此敏锐，靠的可不光是职业敏感，也有设身处地的共情能力。

当然没法要求网约车平台和警察一样专业。可是，机械冷血的运营理念，早晚会让整个平台垮掉。光摆出“万分自责”的姿态，自责完了依旧如故，可是啥用也不顶。企业都不喜欢讲社会责任么？自己的产品“险象环生”，出了事还不积极干预，这给社会造成的伤害，怕是再多的慈善也弥补不了的。

今日社评

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介绍了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有关情况。2018年上半年，国家平台实现异地结算人次达到48.6万(含新农合3.5万人次)，是2017年全年的2.4倍；发生医疗费用118.3亿元，基金支付70亿元。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指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时，只需向就医地的医疗机构支付需个人承担的费用，其他费用就由就医地社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结算，参保地与就医地再按月清算。

实现全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一项重要的便民、利民改革举措，跨省直接结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减轻患者垫付资金的压力，同时减少群众来回奔波之苦。国家卫健委去年对2016年全国788家三级医院收治的2700多万例出院患者进行分析后发现，异地就医患者占比7.16%，即有190多万患者。目前全国三级医院约2300余家，按照国家卫健委有关报告的占比进行粗略估算，我国每年异地就医患者的数量应该不会低于500万人次。

此次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平台实现异地结算人次近50万。通过与往年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虽然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目前已取得显著成绩，但与广大群众的现实需求相比，依然是任重道远。

异地看病报销曾经是许多患者心中的痛，一些困

持续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除了要对部分人群实行优先解决，还要对异地结算之路上普遍存在的某些“掐脖子”问题尽快做出调整。有关部门还应加大改革力度、提高信息化水平，逐步实现与直接结算相关的各项服务管理流程“不见面、零跑腿”，让老百姓的异地结算之路越走越顺畅。

疑难重症转诊至大城市医院的患者，回老家报销医药费“跑断腿”的遭遇令人同情。目前造成跨省就医的原因是，数量众多的跨省流动人口的医保不在常住地。跨省就医的人群主要有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一些老年人旅游或去外地避暑过冬及父母随子女在异地跨省养老，出差人员遭遇紧急情况异地跨省就医，还有就是因区域的医疗技术能力和资源不平衡导致的患者跨省流动。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这项重要便民改革要走

的路还很长。但路要一步一步走，对跨省就医的各类人群要分出轻重缓急，对其中的需求最迫切者实现优先解决。从目前情况看，广大低收入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就业创业人员对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需求最为迫切，他们急需这项改革减轻看病的经济负担，缓解自身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压力。也正是从现实情况出发，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全部纳入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范围。

持续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除了要对部分人群实行优先解决，还要对异地结算之路上普遍存在的某些“掐脖子”问题尽快做出调整。此前群众反映比较多的是，办理流程比较繁琐。相关人员需要先在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备案登记，提交备案表等，之后还需要就医地的经办机构或者定点医疗机构提供证明或者盖章等。目前有关部门已着手对相关手续实施简化，取消一些不必要的证明或盖章。有关部门还应加大改革力度、提高信息化水平，逐步实现与直接结算相关的各项服务管理流程“不见面、零跑腿”，让老百姓的异地结算之路越走越顺畅。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重大民生工程，对参保人而言是利好，同时全国联网也有利于实现对异地就医费用的监控，有利于杜绝假发票、骗取医保资金等行为。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改革脚步要加快，同时，有关部门还应不断扩大改革利好覆盖的人群，根据社会实际需求的变化，让直接结算受益群体范围不断扩大，让群众获得感得到不断提升。

王辉耀专栏

国际人才“大进大出”是国家发展利好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90后”正在成为海归人员主体，出国留学和学成回国的人数均创历史新高，新时期我国国际人才呈现出“大进大出”环流现象，这一特征与国家战略、行业需求的契合度不断提升。

上述报告样本的出生日期主要分布于1985年至1995年之间。根据调查，这些青年海归超过七成于2010年后首次出国，55%在国内读完本科后出国，还有30%在国内读完高中出国。从这些数据中不难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典型画像：独生子女，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高度互联网化，价值观多元，自我意识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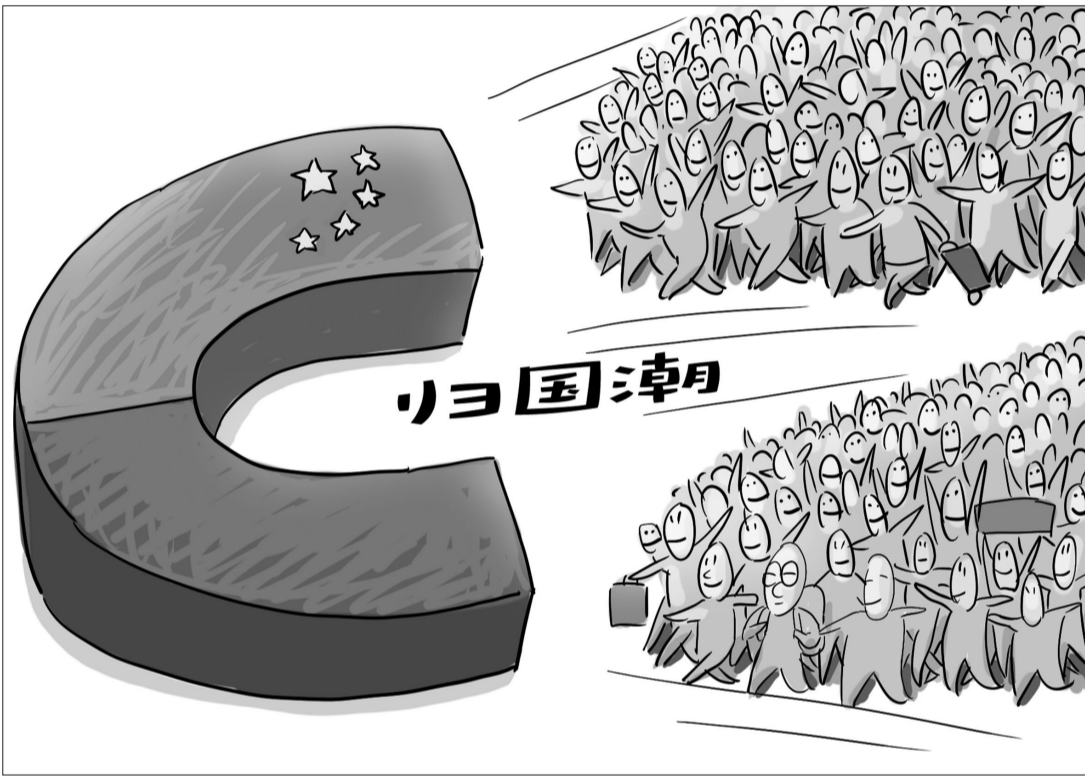
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当代青年海归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态度已逐渐从“仰视”转为“平视”。报告对留学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体验他国文化、生活，丰富个人阅历”是青年海归群体选择出国留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占比达到76%。这种开放心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开放，并有助于推动中外文明平等交流。

此外，当代青年海归留学的主修科目也越来越与国家发展趋势和行业需求契合。报告显示，经济学与商学类占比最高，达到43%，其后依次为艺术与人文科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呈现出文理并重的态势。这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在各领域更好地与世界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媒体注意到《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八成海归不满意收入”的内容，有人担心这样的结果会让人对留学的价值产生怀疑，这里面有一个误会需要澄清。本次调查的样本是以“90后”为主的青年海归，而非所有海归，超过80%的调查对象为参加工作不久的一般员工或基层管理者，在这个阶段，很少有人对自己的收入是满意的，因此，这里说的“八成海归不满意收入”，并不表明海归在职场上已经丧失了竞争力。

报告显示，七成海归税前月薪超过6000元，相比2017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且月薪在10001元至20000元区间增幅高达7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海归的薪资待遇呈现提升态势，而且从人才发展角度判断，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发展后劲更足。

报告显示，关于回国发展的原因，有67%的受访海归选择了“方便与家人、朋友团聚”，只有12%的海归选择了“具有为国奉献的意愿”。专家认为，



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当代青年海归学成报国的志向有所模糊，艰苦奋斗的精神有所减弱。为此，应当大力鼓励当代青年海归在新时代承担起新使命，为中国的发展、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更大的贡献。

报告显示，“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海归就业的最大劣势，因此，青年海归在深刻理解中国、学说“中国话”方面还需要很大提升。青年海归一方面要通过互联网、国内亲朋好友或直接联系企业等各类渠道了解相关信息，另一方面，也要多方了解各地的人才政策和创新创业环境，做到心中有数。青年海归还要深刻理解中国国情，加强学习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深入基层了解社会的运行机制。这将帮助青年海归更好地融入国内环境，更好地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并从中实现个人价值。

青年海归要深入链接世界，需要会说“外国话”。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广泛的国际资源是海归的传统优势，青年海归要继续保持和发展。在落

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青年海归要加强对发达国家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感召下，青年海归要积极与国际主流社会接触，通过到国际组织工作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自信地展示中国形象，发出中国声音，践行中国方案。

有关部门应针对我国国际人才“大进大出”的环流趋势，在政策措施上做出调整和完善。如在为留学回国人员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要探索更多普惠式就业、创业、国情、世情培训，编制符合青年海归阅读习惯的就业创业指导手册，通过新媒体等手段进行传播，帮助他们更快融入国内社会。还可以根据青年海归所学专业分布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对接国内企业需求。

总之，应当贯彻好“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工作方针，持续推进中国国际人才“大进大出”环流趋势，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国际人才势能。

供图/视觉中国

王晓毅专栏

发展集体经济更需完善乡村治理

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乡村治理需要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很多人的共识。道理很简单，如果集体经济是个空壳，村庄没有集体收入，那靠什么人提供农村的公共服务？作为一级组织，村庄承担了许多功能，这些都是要用钱的。往小了说，村庄也有迎来送往，需要接待费用、办公费用；往大了说，村庄也需要救助贫困、雇人干事，如果没有钱，那么村级组织就很难运转。

近年来，村干部的补贴多由财政资金来保障，上级也会拨付一些办公经费，但是对于想干事的村级组织来说，这些钱远远不能满足运行的需求，所以很多地方都提出要发展集体经济，一些地方政府用财政资金直接投入贫困村，支持村庄建立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入。

村庄集体经济不仅能支持村庄的治理，良好的村庄治理也是集体经济存在的前提。集体经济和村庄善治构成了一个事务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村庄集体经济，村庄治理就会面临许多困难；如果没有良好的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也很难发展，甚至可能影响乡村的稳定。

集体经济曾经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难题。上世纪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起很多集体企业，但是大部分都被改制，变成了企业家私人的企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保障企业经营者的责任、权力和利益一致，经营亏损了，企业家没有责任，经营盈利了，企业家也得不到应有的报偿。从集体经营到承包经营，管理

方式的改变没有完全解决集体企业的治理问题，所以最后大都进行了改制，实给了企业的经营者。

此外，集体经济的发展也充满了风险。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曾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甚至提出“消灭空白村”的口号，但是发展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一种情况是，大量村办企业经营不善导致企业破产，并形成村级组织的债务。另一种情况是，依托村内的资源，开发一些如石料、石灰等企业，不仅生产效率不高，而且污染环境。

再次，如果缺少规则和监督，村庄的集体收入可能被村干部乱用，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由于村集体收入的支配权力往往在村干部手里，监管难度较大，一些村干部用村集体收入大吃大喝，甚至贪污腐败，这种现象屡屡发生。即使是村集体收入没有被乱用，但是缺少透明的监督机制，也容易造成群众的猜疑，从而激化村庄内的矛盾。公开、透明和民主监督可以防止干部乱用集体收入，但是监督成本也会很高。

因此，如果不能完善村庄的治理，发展集体经济就无从谈起。现在一些地方意识到了集体经济存在的风险，采取一些特殊策略来规避风险，最简单的方法是放弃集体企业的运营，转而进行投资和资本的运作，比如村庄集体不再办企业，而是经营土地资源，将村庄的土地进行必要的集中，然后转租给外来的企业，村庄获得相对稳定、风险较小的部分土地收益。在部分地区，村庄将村庄自有或财政补贴的钱统一贷给大型企业，从中获得稳定收

益支持村庄公共事务的运行。这种做法尽管可以规避集体经济的市场风险，但是难以规避集体经济中的道德风险。

发展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发展集体经济切忌一哄而上，要避免当年“消灭空白村”的后果。

首先，要大幅度降低集体经济的风险。发展集体经济需要可靠的资金来源，财政补贴、集体的资源和农民的入股，都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可靠资金来源，举债特别是高息举债则是不安全的，会放大集体经济的风险，所以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特别谨慎依靠信贷资金发展集体经济。为了减少风险，可尽量选择比较稳定的产业和经营方式，避免风险较高的产业。各地在这方面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入股大型龙头企业，收益用于村内互助和管理村庄集体资源和资产等等。

其次，要有配套的治理体系。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既要有负责任的村干部，也要有懂市场的经理人，更要有公开透明的参与管理机制，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增强村庄内部的信任。集体经济管得好，就能成为乡村治理的抓手，如果管得不好，就可能成为乡村矛盾的焦点。因此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必须要大力完善村级治理。

乡村治理不会因为有了集体经济而变得更容易，不是说村庄有钱就好办事了。相反，有了集体经济，就更需要完善村庄治理机制，集体经济本身就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